

鲁迅、夏丏尊与日本教习关系考

——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期为中心

孙立春 项婉倩

史
家
拍
案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后,鼓励开设新式学堂。由于能够传授新知识的师资不足,各新式学堂都聘请了大量的外籍教师,其中日本人最多,他们被称作“日本教习”。1906年筹建、1907年开始招生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也不例外,先后聘请了10位左右的日本教习。他们来杭州时大多是年轻教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一般任教仅2—3年,但他们回日本后,基本上都成长为大学校长、教授或中小学校长。关于他们的教育教学活动、与鲁迅、夏丏尊等中方教师的交往情况,由于资料的限制,大多语焉不详。为了厘清这一段历史,笔者主要参考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和日方资料,再结合已有的、零散的中文材料,做一次全面的梳理。

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日本教习基本情况考证

甲午中日战争后,杭州被迫成为对日开放口岸,日本政府在宝石山下设立了领事馆,在拱宸桥一带拥有了租界。驻杭日本领事馆每年都要对在杭的日本人进行摸底调查,并定期上报日本外务省。关于清政府雇佣的日本专家、教习,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有《清国雇佣本邦人名表》《支那雇佣本邦人名表》等档案,其中有明治

41年(1908年)1月—4月、明治42年(1909年)12月—43年(1910年)5月、大正3年(1914年)12月的调查结果。这是南里知树^①、汪向荣^②等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所倚重的第一手资料,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中日学者的统计资料有些出入和错误。笔者主要依据外务省的原始档案,再结合中日学者的先行研究,整理出以下表格(见下页)。备注部分侧重分析先行研究的异同点。

除了以上三种资料,还有一些中日文资料涉及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日本教习。郑晓沧在《浙江两级师范和第一师范校史志要》中提到:“初开办之二三年中,有不少日籍教员。凡有八人,以博物科为最多,图画、音乐亦有日籍教员。选科有中桐确太郎教教育学,史地科有铃木克己教西洋史,博物科教员有教植物学的铃木龟(应为“珪”)寿、教动物学的本多厚二郎(应为“本多厚二”)、教矿物学的本多厚二郎或木村卯三。到了1911年,日本教员几已全部回国了(此说法亦有误,本田利实1914年还在任教)。那时有不少师资是和浙江高等学堂相通的,例如博物的铃木龟(应为“珪”)寿、音乐的元桥义(应为“义”)敦都是两校合聘的。”^③

与以上三种资料相比,郑晓沧多举出两位日本教习,即铃木克己和木村卯三。

武安隆也根据这条信息,在《新见日本教习——对汪向荣先生所列〈日本教习分布表名单〉的补充》中,加上了铃木克己。^④由于各种限制,郑晓沧并没有参考日本外务省档案,因而搞错了部分人名,但他走访了与日本教习同时任教的钱均夫、姜丹书以及当时的学生吴克刚等人,所以这两个日本教习很可能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不过,郑文认为鲁迅任动物学教习的翻译,杨乃康任植物学教习的翻译。这明显是张冠李戴的错误。陈星可能也根据郑晓沧的论文,在《杭州师范大学百年史稿》中列举了中桐确太郎、铃木珪寿、铃木克己、木(应为“本”)多厚二、吉加江宗(应为“吉加江宗二”)。^⑤另据《福井直秋传》,福井直秋是受

长野县师范学校的同事、副校长原田的邀请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而原田早于福井直秋来到该校。^⑥但是,日本外务省档案、南里知树和汪向荣资料都显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没有这个姓“原田”的日本教习,而且浙江省的教习名单里都没这个人。

关于日本教习的生活,我们仅知道他们与中方教师相处比较融洽,待遇优厚,工资不仅高于鲁迅、夏丐尊等中方教师,而且也高于当时日本同层次的教师。关于他们的工作,郑晓沧总结为:“此等日籍教师类皆有一定的专业造诣和修养,庄严肃穆,教学上颇能负责,难得告假。动植矿等教学,皆注重标本,并也联系本地实际,鼓励采集。”

姓名	月薪(单位:银元)	被聘日期	截止日期	籍贯	备注
铃木珪寿	80	1905.8 1909.8	1908.6 1910.7	福岛县	主要在浙江高等学堂任教,两级师范学堂为兼职。关于任期,外务省档案分为两段;南里知树的说法(1905.8—1909.7)有误,因为鲁迅为铃木珪寿做翻译到1910.7;汪向荣资料均无任期,显示铃木珪寿为浙江高等学堂和安定中学堂教习,此说法似有误。
元桥义教	110	1906.8	1908.7	东京府	主要在浙江高等学堂任教,两级师范学堂为兼职。南里知树资料显示任期为1906.8—1909.8。
吉加江宗二	200	1908.5	1910.5	宫崎县	南里知树资料与外务省档案相同,汪向荣资料误作“嘉江宗二”。
中桐确太郎	300	1909.4	1911.5	福岛县	南里知树资料显示任期从1908年5月开始。
本多厚二	240	1909.4	1910.3	长崎县	南里知树资料与外务省档案相同。汪向荣资料作“本多原二”,有误。
福井直秋	150	1909.9	1910.8	富山县	南里知树资料与外务省档案相同。汪向荣资料将此人列为安定中学堂教习,有误。
本田利实	100			宫崎县	师范学校教习、日文图画手工教授。外务省档案作“本田利贞”,似有误,因为南里知树和中文资料均作“本田利实”。汪向荣资料无此人。

关于铃木珪寿和中桐确太郎的个人情况、教学经历,下面会重点论述。在此也顺便介绍一下其他几位教习的情况:元桥义教在浙江高等学堂和两级师范学堂担任音乐教师,来华前就出版过《小学校唱歌教授法》(教育书房,1898年)。吉加江宗二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担任图画教师。当时的学生吴梦非回忆道:“图画教师是日人吉加江宗二,他是东京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科毕业的。教我们的方法和小学里差不多,也是注重临摹,不过他的绘画技术比较高明。他用的教材常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范本’,间或也用‘水彩画范本’。教我们手工、音乐的也是日本人。”^⑦本多厚二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担任动物学教师。福井直秋(1877—1963)是日本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1902年从东京音乐学校毕业,先后担任富山县师范学校、长野县师范学校教师;1910年9月回到日本后,任东京府立三中、东京府青山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创办武藏野音乐学校,1949年成为升格后的武藏野音乐大学第一任校长;出版《初等和声学》、歌曲集、唱歌集多部,作曲1000余首。本田利实是手工课教师,教授木工、金工、竹工及黏土工,重点在木工,夏丏尊担任他的翻译。

二、鲁迅与日本教习

鲁迅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就职于建校一年多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鲁迅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课程,并在铃木珪寿的植物学课上兼任日语翻译。这是他的第一份职业。意气风发的鲁迅勤勉刻苦,一丝不苟,时常伏案至深夜,编出通俗易懂又不失文雅的讲义,为许多学生所爱戴、尊敬。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建筑和学制、课程

设置等方面,均模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筑波大学),而且聘有多名日本教习,让他们担任博物、图画、音乐、手工等课程。至1910年7月鲁迅辞职为止,他认识的在职日本教习应该有铃木珪寿、本多厚二、吉加江宗二、中桐确太郎、福井直秋。不过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铃木珪寿。也因为鲁迅的关系,铃木珪寿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日本教习中最受人关注的,经常出现在鲁迅年谱、传记和回忆文章中。而其他教习或因为在校时间短,或因为与鲁迅、夏丏尊等没什么交集,很少出现在中文资料里,而且他们的日文传记里也很少提及在华任教经历。

关于铃木珪寿和鲁迅的合作情况,现有的中文资料^⑧一般都会提及:铃木讲课时,鲁迅在通往标本室的过道里吸烟,等铃木讲完一段才上台翻译。有时铃木讲错某个问题,鲁迅会给他纠正。铃木发现后,每每朝着鲁迅笑笑。学生提出不得当的问题时,鲁迅就不译给铃木听,而是自己说明一下。此外,他们还曾同游兰亭,有时带学生去孤山采集植物标本。当然,他们之间最著名的当属“一枝黄花”事件,在此就不赘述了。

铃木珪寿生于1867年12月9日,为福岛县白方村村长铃木藤右卫门的次子;毕业于须贺川小学,入福岛县师范学校并以第一名毕业;1888年3月,经推荐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三年后毕业,回到母校福岛县师范学校任职;1893年、1899年、1901年,分别任栃木县师范学校教师、宫城县师范学校副校长、茨城县师范学校校长;1904年6月担任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大塚分院直隶班学监^⑨,校长即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1905—1910年任浙江高等学堂教习,并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兼职,月薪280银元,回国后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三等宝星^⑩;1911年12月1日,在东京板桥町创办丰岛实科女学校,为之后创办的丰岛高等女

学校打下基础;1912年6月,出任板桥小学校长,后于1920年8月辞去校长一职,期间曾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期的同事福井直秋合作板桥小学校歌;因罹患直肠癌,1933年4月终止一切教学活动;1934年受到帝都教育会长、丰岛区长及丰岛教育会长的表彰;病逝于1936年11月11日。^⑩

1909年12月末,发生了远近闻名、轰动杭州教育界的风潮——木瓜之役,其本质实为“一场文学色彩浓厚的新旧文化教育思想斗争”。^⑪木瓜之役以鲁迅、许寿裳、杨莘耜(乃康)、夏丏尊等留日归国教员为斗争主体,取得胜利后,25名教职员还在湖州会馆留下纪念照。木瓜之役中,日本教习没有参与罢教斗争,而是遵照夏震武的指示去上课,但学生们不同意,因而集体罢课。虽然日本教习们在木瓜之役中并无可圈可点之处,似乎带有旁观者的冷漠,但他们的表现又有合理之处。因为他们不懂中文,既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又担心自己的饭碗不保。相关史料对期间各个日本教习的记载较少,多为模糊带过,因而在此只能进行笼统的说明。

然而,日本教习对学生是极为严格的,例如著名的“打呵欠”事件。日本教习认为学生在课堂上打呵欠是十分不敬的行为,想给那个学生记过,但学生们强烈反对。作为调解人的鲁迅则从双方的立场做了分析:从教员的立场来看,学生们在课堂上没有集中注意力听讲;从学生的立场来看,教员的授课不够引人入胜。既然记一人过遭到反对,那不如全员记过,而全员记过等同于没有记过。这样鲁迅就巧妙地化解了日本教习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并在暗中支持了学生的做法。“打呵欠”事件说明鲁迅对于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同时也善于从学生的立场考虑问题。

由此可见,鲁迅与日本教习的交集多为学术上、教学上的交流。其中与铃木珪寿的交往较为密切,也较为友好。而当学生提起

有的日本教习藐视中国学生时,鲁迅这样回答道:“这也不必怪人多事,应该自己争气……自己不肯争气,只会怪人多事,在个人是一种愚蠢,在民族是一种灾难。”^⑫可见,鲁迅对当时中日两国的认识很清醒,没有因个别傲慢的日本教习而忽视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

三、夏丏尊与日本教习

1908年春,应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沈钧儒的邀请,22岁的夏丏尊担任日语教师,并为讲授教育学的中桐确太郎做课堂口译。南里知树资料显示,中桐确太郎的任期从1908年5月开始,那么他就是日本教习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人,而且有可能和夏丏尊合作了3年时间。除了中桐确太郎,夏丏尊也为教手工课的本田利实做过课堂口译。因此,从时间上来看,中桐确太郎可以说是与夏丏尊交往最密切的日本教习。

中桐确太郎(1872—1944)于1893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文学科,1903年任早稻田大学讲师,1927年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期间兼任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部长一段时间。中桐是一名教育学家、伦理学家、逻辑学家,著有《逻辑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6年)、《逻辑学纲》(圣山阁,1926年)等,同时也与近似于佛教的宗教团体——一灯园关系密切,著有《光明祈愿》(春秋社,1923年)等。他受王廷扬之邀来两级师范学堂前,已经是早稻田大学讲师,因此月薪是日本教习中最高的。关于他在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学活动,郑晓沧说“教育教员中桐确太郎尤为人所称道。”后来的一些学生回忆两级师范学堂的史料也提到:“给袁心繁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位讲授教育学的日本教师中桐确太郎。他因此对教育发生浓厚的兴趣,为献身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⑬可见,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教

学上,中桐确太郎都具有一定影响力。

但经亨颐在《杭州回忆》中写道:“重到杭州,相见甚欢,一位日本教员中桐确太郎还在,我和他论友谊还好,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他以为我在日本不过一个学生,回国来居然当教务长,有些看不起我,而且他口头常有侮辱中国的话,我当然不让他的;第二次回来相见,态度不同,我想你还在,支配教课伦理还没有人担任,我不愿意国文教员担任讲一套毫无意义的伦理,所以请他讲,他竟嘲笑地说伦理可以请外国人教吗!”^⑤由此可见,日本教习与中国师生之间也存在着嫌隙,藐视中国师生的情况是存在的。不过,这也成为经亨颐讲授、研究伦理学的重要契机。值得注意的是,经亨颐在上述文章中还提到他1908年第一次到两级师范学堂时,从母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带回吉加江宗二和另外一名日本教习(可能是本多厚二),并与他们一起谒孔,而这两名日本教习跪拜时一直在低声地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治维新后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关系发生逆转,日本从学生变成了老师。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日本教习从尊敬、崇拜而又期望超越中国的立场,转而走向蔑视中国历史文化、靠拢西方而又独立发展的方向。

而对于夏丐尊来说,大他14岁的中桐确太郎相当于前辈、师长。中桐是日本著名作家国木田独步的挚友,而夏丐尊之所以翻译、出版《国木田独步集》,估计与中桐的推荐有关系。中桐的朋友中还有宗教思想家纲岛梁川和西田天香,他们对佛教、基督教均有所研究。思想家纲岛梁川是向日本知识分子介绍西田天香的第一人,1838年出生于冈山。19岁时寄居在当时的作家、剧作家、思想家坪内逍遥家中,后与岛村抱月、后藤宙外、金子筑水等同为《早稻田文学》的编辑,负责美术评论和伦理思想评论等。中桐也曾师从坪内逍遥,后与纲岛梁川一同活跃在“哲学会”。据

说纲岛梁川已达到“神人合一”的境地,与东本愿寺的清泽满之为明治精神界的代表人物。他们身后有着众多的追随者,如德富芦花、石川啄木等。芦花在《蚯蚓的戏言》中谈及纲岛梁川和西田天香的关系。在纲岛梁川去世时,啄木更是深受打击,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悲痛的心情。这些虔诚的信徒们在各地结成了“梁川会”,还出版了类似于同人杂志的“回览集”,西田天香和中桐确太郎就在其中。^⑥然而,纲岛梁川与西田天香的宗教观念依然有出入,因此不像中桐一样,一生都支持着西田天香和一灯园。中桐本人则是与西田天香共同起草一灯园生活规范——《光明祈愿》的终生挚友。

在杭州期间,中桐曾赠予夏丐尊一个“谢罪袋”,而这个“谢罪袋”就来自于西田天香创立的宗教团体——一灯园。夏丐尊在《日本的一灯园及其建设者西田天香氏》中写道:

这位中桐先生是与日本宗教团体很有关系的,有一天,他送一只小小的布袋给我,叫我带回家去,转赠母亲。母亲死了,这袋至今尚在。袋的里面写着几句话:

一,这叫做谢罪袋。

一,将佛的东西认作我的东西,这是罪。请把为谢这罪而归还的金钱,装入此袋,和立在门口的人结真的佛缘。

一,这“归还”不要认为“减少”。我们原可无忧的被养活,所以弄到非苦闷不能生活者,完全是由于要妄用自力的缘故。

一,请依了真的佛道如数归还了试试看!比未归还以前,可得幸福的生活哩。要研究这理由的,请依溯了这袋的来处来问。

一,漫然施金钱于寺院或慈善,并不是成佛之因。

一、出心比出金钱更要紧。

那时记得中桐先生和我说过他朋友西田某的为人,且说这布袋就是从他的宗教团体中来的,他们团体中节衣缩食,做成种种纪念用品结缘,这袋就是其中的一种。我那时年方二十二岁,于人生的烦闷,尚未入门,亦只平常视之,认为是一种普通宗教家的劝人的行动而已。过了几年,我年龄大了。又因种种的不幸,引起了人生的烦闷,于是也居然欢喜看起宗教上的书来。^⑩

之后,夏丐尊读了纲岛梁川的《回光录》和西田天香的《忏悔的生活》《托钵行愿》后,对中桐的这两位朋友渐渐熟识起来。这段由中桐联结的宗教之缘,对此后夏丐尊在佛教方面的理解,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此,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西田天香的思想。西田天香本名市太郎,别号天华香洞主人,1873年生于滋贺县;21岁时赴北海道垦殖,经营多种产业均失败,受托尔斯泰的《我的宗教》影响;32岁时断食坐禅三日后开悟,从此浪迹于十字街头,沿街边行善边乞食;1913年在京都市鹿谷建设一灯园,名字来源于朋友纲岛梁川的《一灯录》。在《托钵行愿》中可以看到,一灯园的成员有宗教家、实业家、教育家以及艺术家等,其中宗教家和实业家各占百分之三十。宗教家中有净土真宗、禅宗、法华宗、真言宗、金光教、天理教、基督教乃至大本教等各种各样的人士,而其中大部分都与佛教有密切的联系。

西田天香积极推动无我、离欲、忏悔等精神运动,崇拜“光”(与大自然、神、佛同义),主张“无一物、无所有、无尽藏”。他所著《忏悔的生活》附有《光明祈愿》的主要内容。摘录部分如下:

不二の光明は宇宙に遍満する陽光の如し。物あり、之に觸れて、色々の

光を發す。

(不二光明如阳光普照宇宙。有物,触之,散发各光。)

一、不二の光明によりて新生し、許されて活かきん。(不二光明赋新生,宽恕众生。)

二、諸宗の眞髓を禮拜して歸一の大願に参ぜん。(礼拜诸宗真髓,参归一大愿。)

三、懺悔の爲に奉仕し、報恩の爲に行乞せん。(为忏悔而劳作,为报恩而行乞。)

四、法爾の清規に随ひ、世諦を成ぜん。(尊法尔清规,成世间俗谛。)

五、即ち天華香洞に歸り無相の樂園に逍遙せん。(皈依天华香洞,逍遥于无相乐园。)^⑪

从他的思想主张来看,一灯园与佛教的联系十分紧密,可以说是新兴的佛教宗派或佛教的一个分支。夏丐尊也说“(一灯)园的清规,略如寺院所为。”夏丐尊的这篇文章写成于1923年9月,他特别强调,“时距日本大地震仅四日”。此时,“世界正沸腾着人间苦的合唱,我国又特别的自扰得几乎不留干净土。在这时机中,介绍这圣贤的团体到国中来,也不是无意味的事吧。我很以有这介绍的缘为幸。”其实,夏丐尊早在求学于上海中西学院时,便已经接触过宗教,只不过总是要礼拜、唱赞歌的基督教并不适合他。相反,从《日本的一灯园及其建设者西田天香氏》一文中可见,他对一灯园的创立者西田天香十分欣赏,对那种青灯常伴的佛教式生活极其向往。因此,相比起基督教,佛教更能感化夏丐尊。而“过了几年,我年龄大了。又因种种的不幸,引起了人生的烦闷,于是也居然欢喜看起宗教上的书来。”这说明夏丐尊与西田的心路历程类似,都在青年时期接触了佛教并深受其影响,后在经历了人生的苦恼之后,逐

渐皈依了佛教。

由此可见,夏丐尊自发地接近佛教,与西田天香的思想分不开。不过,如果作为一灯园传道者的中桐确太郎没有多次向夏丐尊介绍西田天香,夏丐尊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佛教观,更不可能助缘弘一法师出家。由此可见,中桐确太郎不仅让夏丐尊领略到国木田独步等日本作家的魅力,进而翻译了《国木田独步集》,而且在人生观、文化观、佛教观方面,通过介绍西田天香及一灯园,对夏丐尊产生了较大影响。年少时“热闹”的基督教没有给夏丐尊带来感化,而中桐确太郎的“谢罪袋”则带给了夏丐尊关于一灯园和佛教的思索。

结语

综上所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聘用的日本教习不仅出色地承担了当时中方教师还不能胜任的博物、图画、音乐、手工等新课程,传播了新知识,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与鲁迅、夏丐尊等中方教师交往比较密切,合作比较愉快。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创作上,他们都对尚处于青年时代的鲁迅、夏丐尊等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① 编有《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Ⅱ集》,龙溪书舍,1976年。

② 著有《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10月。

③ 郑晓沧:《浙江两级师范和第一师范校史志要——近代浙江地方教育史资料之一》,《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④ 武安隆:《新见日本教习——对汪向荣先

生所列〈日本教习分布表〉名单的补充》,《日本学刊》,1992年第6期。

⑤ 杭州师范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师范大学百年史稿》,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⑥ 福井直秋伝記刊行会:「福井直秋伝」、武蔵野音楽大学、1969年、第86页。

⑦ 吴梦非:《“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段》,《美术研究》,1959年第3期。

⑧ 如张能耿:《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上海文学》,1961年第10期;吴克刚:《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Z1期;张直心、王平:《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史实探微》,《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等。

⑨ 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铃木时任茨城县师范学校校长,当时他们应该没有接触。

⑩ 关于这一点,「豊島高等女学校記念誌」将铃木珪寿的任期误作“1905—1908”。

⑪ 豊島高等女学校同窓会:「豊島高等女学校記念誌」、豊島高等女学校同窓会、1983年、第9—13页。

⑫ 赵林:《辛亥前后杭州新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以“木瓜之役”和“浙一师风潮”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⑬ 张向天:《鲁迅日记书信诗稿札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64页。

⑭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15辑师魂续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⑮ 吴战垒:《说不尽的西子湖》,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223—224页。

⑯ 三浦隆夫:「一燈園 西田天香の生涯」、春秋社、2008年、第86—92页。

⑰ 夏丐尊:《日本的一灯园及其建设者西田天香氏》,《东方杂志》,1923年第20期。

⑱ 西田天香:「懺悔の生活」、春秋社、1921年、第1—3页。笔者译。